



評“圖書館學書籍聯合目錄”

譚家琛 潘桂芬

不久以前，中華書局出版了一本“圖書館學書籍聯合目錄”，編者李鍾履先生，主編者北京圖書館。值此全國各個戰線上繼續大躍進的時候，給圖書館工作者提供書目，幫助學習業務，提高水平，顯然是十分切合時宜的。遺憾得很，這本目錄，完全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那樣，不論內容和結構，都有嚴重的缺點，甚至有原則性的錯誤。這些缺點和錯誤，不管編者意識到與否，其結果必然會引起不好的影響。為了促起我們圖書館界普遍的注意，特地在此提出我們的意見。

在提出意見之前，需要說明一點，這個目錄在其題上項印有“圖書館學參考資料”字樣，我們以為，這樣標明的目的，無非是告訴我們，這本目錄是參考性的，不是推薦性的。但是據此為由，從而認為編制目錄的党性原則和科學原則在這裡不適用，這是錯誤的，不能容許的。這本目錄既經公開發行，印了二千八百本，註明“參考”字樣也好，不註明也好，反正將有數以千計的讀者受到它的影響，它就要起着宣傳推薦作用，我們就得對讀者負責，這不是很明显的事嗎？同時，這本目錄，與那些純粹反映參考批判資料的供參考用的目錄，也不相同。後面這種目錄，就內容說，只收陳舊反動的資料；就使用對象說，有條件限定，並不公開發賣。而本目錄既有舊的東西，也有新的東西，甚至包括革命導師的經典著作。怎麼能一概而論，僅供“參考”之用呢？

目錄學有鮮明無比的強烈的階級性，資產階級目錄學與社會主義目錄學之間，沒有任何調和的余地。任何以“客觀”主義的幌子，來掩飾或否認它們之間的原則區別，是根本錯誤的。

在社會主義目錄學的發展過程中，資產階級目錄學家用各式各樣的“理論”，在形形色色的幌子下進行公開的或隱蔽的抵抗，這是必然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也就是兩條道路的鬥爭在目錄學領域內的反映。在蘇維埃目錄學理論發展的過程中，就曾碰到過不少資產階級目錄學的“理論家”，說目錄僅僅是參考的工具，詳盡無遺的目錄就是科學的，

他們用“客觀”主義的假面具掩飾自己，斷言目錄不能強迫讀者接受這些或那些圖書，不要影響讀者去挑選圖書，認為只有這樣才是“公正”地反映圖書館的藏書，等等。這些虛偽的資產階級的謊言，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面前——被粉碎了。在目錄學領域內兩條道路鬥爭的過程，就是蘇維埃目錄學理論發展與提高的過程。

目錄是宣傳圖書與指導閱讀的工具。我國當前的圖書目錄的任務，就是貫徹“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生產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黨的文化事業的方針。它要實現這個艱巨而光榮的任務，決不是按字順照抄或形式主義地列舉出版物所能達到的，而必須在高度的党性原則指導下，在選材上、著錄上、排列組織上，認真負責地好好加以處理，使其體現高度的政治思想性和科學性，保證給予讀者以正確的指導。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本目錄，它符合不符合上面所說的這些要求呢？完全不符合。這本目錄，由於編者缺乏無產階級思想指導，在選材上力求詳盡無遺，有書必錄，不管內容如何反動、如何反科學，新舊兼收，一視同仁，不加任何選擇，結果反動的有毒素的東西，完全陳舊的毫無參考價值的東西，占了大多數，成為本書的主要內容和基礎。在組織排列上，編者又在形式主義的支配下，一律按字順排，新舊並列，雜亂無章。這一來，使得這本目錄完全失去了政治思想性。這就決定這本目錄不可能為社會主義服務，而只能為資產階級思想勞累了。

編者在選材上竟荒唐到如此地步，連反動頭子王云五的“(962)新目錄學一角落”與“(193)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也不願割愛。特別應當指出的，編者大約覺得王云五的名字實在太見不得人，在目錄中僅只著錄其書名而刪去了他的姓名。不禁要問，這樣做是不是就可以不使讀者受到有害的影響呢？又如偽國防部、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等圖書館編印的東西，以及杜定友編“三民主義分類法”之類的極其反動的東西，多得不勝枚舉。再如（美）佛里特的“(743)圖書館員之訓練”（1929年出版），

(美) 紧約翰亚当的“(306) 民众图书馆的行政”(1934年出版), 等等之类的东西也很不少, 像这样反动的, 陈旧的, 以及帝国主义的货色, 难道还有什么精华值得吸收? 还能社会主义服务?

同样, 没有政治原则也表现在著录上。如:“(514) 空军军用图书分类法草案, 余炳元, 1948. 南京, 空军总司令部图书馆”。编者竟按着旧目录片照抄不误。著录这类反动机关时, 其前不冠以“伪”字, 以揭示其政治面目, 这是完全不对的。但也得指出, 如(887)(889)项下的出版者为“伪国防部”, 于反动机关之前又加了“伪”字。有些地方必须统一而又可能统一的, 都没有把它们统一起来, 好比有的有页数, 有的无页数; 页字有的写作页, 有的写作叶; 有的有出版年, 有的没有出版年(当然不是指的書上本身就没有出版年的), 如“(249) 中国航空学校图书馆概况”, 就未著录出版年。象概况之类的东西, 不反映出时间来, 当然是不可以的。这書既是概况, 查出年份总是可以办到的。从以上这些情况看来, 说明编者在工作中潦草从事, 缺乏認真負責的态度, 这是对讀者不負責任的表现, 是完全不应该的。

本目录考虑到检查方便, 除編有 著者索引之外, 还編了一种主题索引。按理, 在主题索引中当可体现很强的政治思想性和学术性, 但出人意外, 編者只是草率地随便地在書名字順目录中, 摘录一些带有共同性的詞彙, 就算作主题。目录中陈旧不堪的货色很多, 相应地陈旧不堪的主题也就很不少, 像“佛学图书馆”、“图书馆与民众教育”、“国际图书馆”, 等等, 这哪有一点像是我們今天应该拟定的为当前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主题呢? 又怎么能設想, 在今天还会有这样的讀者按照这样的主题去查找資料呢? 更难以容忍的是: 在“国家图书馆”这一主题下列举的資料, 既包括现在的北京图书馆, 也包括伪中央图书馆。在“机关团体图书馆”主题下, 全是指的反动机关团体的图书馆。难道在編者看来, 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和今天的人民民主政权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嗎? 国民党的机关团体和今天人民的机关团体是一回事嗎? 不难看出, 編者在政治上已經麻木到什么地步!

前面说过, 这本目录在内容上, 新旧兼收, 而且旧的占了多数, 加上按字順排列的組織形式, 这就无形中使得新的东西被湮沒, 旧的东西受到更好

的宣传, 从而大大影响到本書的政治倾向性。更令人气愤的是, 連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的著作, 也杂揉一起, 沒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这决不是編者一时的疏忽, 而应该在他的学术立場和观点上找原因。由此可見, 目录的組織編排形式, 是值得我們很好研究的問題。我們認為, 如果改用分类排列,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克服本書的缺点, 体现出一定的政治思想性。不过, 目录的内容始终是主要的基本的, 目录的資料必須認真加以挑选, 剔除其有毒害的东西, 坚决反对“有書必录”的客观主义的作法。如果为了满足科学研究的需要, 适当地附录一部份有代表性的供参考批判用的資料,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在組織編制上則必須改用分类排列, 以便显著地把它們划分开来。联合目录按分类排列組織, 不仅在理論上是可以說得通的, 在实践中也証明是行之有效的。例如, 乌克兰科学院图书馆編的外文杂志联合目录, 就是采用按分类字順排列的办法来組織資料的, 它将所有資料分为若干大类, 大类之下再分若干小类, 小类下按字順排列。这就显得目录的政治思想性很强。現在这本目录, 資料并不太多, 那就更好办, 首先把新旧的資料分开, 旧的資料作为附录处理, 新的資料先按类排列, 类下再按出版物的重要性、質量或依出版时期反紀年地順序排列。这样, 不但可以加强对好書的宣传和推荐, 并可通過互見等办法, 使那些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著作, 得到突出的和广泛的反映, 用以增强思想性。旧的資料附在各类之末, 空一格著录, 字体小一些, 与新資料显著地区别开来。为了便于检索, 还可以編制書名索引和著者索引, 在这里, 新旧資料同样也应分开, 把旧的出版物及其著者分別附在这两种索引的后面, 也空一格著录, 字体小一些。同时, 在封面、書名頁等处的書名之后, 注明如下字样: (附录参考批判資料); 在例言中也作出必要的說明。我們認為, 照上述办法来处理这本目录, 比起按字順排列来, 显然能够表现一定的政治思想性, 而且使用起来也方便得多。同时也可以知道, 排在前面的是新出版的質量好的著作, 附在末尾的是参考批判的东西, 使讀者一目了然, 知所取舍。自然按分类排列, 在工作过程中是会碰到一些困难的。但是为对讀者負責起見, 为使这本目录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我想任何困难都应该設法克服, 何况这里并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問題在于編者是不是注意了目录的政治思想性, 是不是重視了这本目录会在讀者中間产生不好的影响。